

长期保障、投资回报与迁移劳动力回流决策

石智雷 易成栋*

摘要: 本文以我国特殊的转轨过程和制度环境为背景,尝试建立一个解释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微观模型,侧重分析家庭禀赋改变劳动力迁移预期以及投资回报率的条件下,劳动力如何通过方向不同的迁移决策来回应制度约束,改善自己的长期福利。研究发现,长期保障的缺失是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核心障碍,而农村家庭禀赋的长期保障效应和投资回报效应是当前部分迁移劳动力主动回流农村的主要动力。在城市不能获得长期保障的条件下,迁移劳动力很容易选择回流,或者是在城市和农村间往复式迁移以获得城市部门的高收益,同时还可以维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的长期保障。文章还利用武汉市迁移劳动力调查数据对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和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关键词: 长期保障 投资回报 劳动力回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国外学术界对劳动力回流问题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模型,如生命周期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等。生命周期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简化为两个阶段,年轻时候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以后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在城市和农村推拉力都没有变动的情况下,那些“生命周期”到了应该回去阶段的迁移劳动力,也会按预期回到农村(Davies and Pickles, 1991)。新迁移经济理论从相对贫困和相对购买力的角度对劳动力主动回流做了解释,认为回流更多的是出自以下原因:没有在城市找到体面的工作,在城市打工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家乡会带来更多的回报,在家乡的生活成本更低(Stark, 1996)。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城乡劳动力的迁出和回流构成了中心和边缘地区资源交换的不平衡机制,农村-城市移民有规律地回到家乡,在农忙季节为农村家庭提供帮助,参加人生阶段性庆典;只有失败的打工者才会永久性返乡,他们是因为年迈、生病或者其他原因被淘汰出城市部门,回到农村形成一个农村社会劣势群体(Sander, 2007)。另外还有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理论(Guilmoto and Sandron, 2001)、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理论(Thomas, 2008)等对劳动力回流问题做了探讨。有些观点认为,迁移者之所以选择回流主要考虑的是家乡和目的地的相对价格水平、迁移者在外地务工挣得的积蓄在家乡的消费效用最高(乡土情结)以及迁移者的主观偏好等等(Dustmann, 2003; Mesnard, 2004),也有可能是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而被迫回流(Bastia, 2011)。国外学术界的不同学科不同理论学派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劳动力回流现象做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着自己的侧重点,且价值判断也趋于多样化。事实上,上述回流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迁移者经济和非经济的回流动机,但也只是对处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或者某一特定区域的劳动力回流现象的解释。对于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往复式流动及长期“半城市化”现象并不能提供有力的解释。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民工潮”未退,政府仍在为如何消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绞尽脑汁的同时,部分地区又频繁出现了“民工回流”、“民工荒”现象。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显著的特征是“半城市化”和“往复式迁移”现象^②,明显迥异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过程。绝大多数农民工并不一定准备在流入地定居;他们把家庭留在原籍乡村,自己则根据工

* 石智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信箱:shizhilei2004@126.com; 易成栋,中央财经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管理系,邮政编码:100081,电子信箱:yichengdong11@hotmail.com。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②也有学者称之为“钟摆式”迁移(周大鸣,2005)。

作机会四处流动;如果挣了钱,就回到原籍乡村盖房子、结婚(李路路 2003)。或者,他们“流而不迁”,“像永恒的钟摆,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来回摆动”(周大鸣 2005)。在研究中国迁移劳动力的“往复式”流动时,国内一些学者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修改,把托达罗模型中乡村劳动力的一次性终生决策改为年度性决策,相应把城乡预期收入比较的对象由托达罗模型中的城(乡)多年预期收入的现值改为城(乡)当年的预期收入(周天勇、胡锋 2007)。张露文(2005)通过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认为寻求人力资本的充分激励以及在收入分配中的有利地位,是农民工在城市限制政策的压抑下选择回流的重要原因。刘铮(2006)研究认为,在从事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不断提高(尽管提高的程度有限),而外出打工的收益常年得不到改善,打工还要承担很多潜在风险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将选择风险小、收益提高、还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回乡务农。白南生和何宇鹏(2003)研究认为,人口流动的生命周期分析对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如婚姻、抚养、子女教育等非经济性因素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的作出具有重要影响。章铮(2009)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定居和回乡的条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只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基本使用青年民工的局面不改变,面临着中年失业前景的绝大多数民工家庭就不可能具备进城定居的经济能力,他们只能选择中年回流至农村。国内学者主要从预期收益、生命周期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回流的原因,虽然也注意到人力资本回报率的重要性,但缺乏理论化、模型化方面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更未能走出国外迁移理论研究的窠臼。根据中国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实际问题构建解释模型。

本文拟将以我国特殊的转轨过程和城乡环境为背景,将长期保障、投资回报和风险偏好引入劳动力迁移的个体效用方程,尝试建立一个解释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微观模型。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1)中国迁移劳动力为什么选择往复式流动?他们融入城市,实现真正市民化的核心的障碍和阻力是什么?(2)中国迁移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动力因素是什么?影响机制是怎样的?(3)农村迁移劳动力如何通过理性的迁移决策来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

二、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假设与变量界定

(一)劳动力迁移的总效用方程

假设每个劳动者都从各自的消费(C_s)、闲暇(L_s)和保障性储蓄(S_v)中获得效用 $U(C_s, L_s, S_v)$,劳动者生命周期总时间为 T 。

从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角度来看,一个农村劳动力一生中可能经历三个迁移过程或者三个阶段,第一时期(H)是农村劳动力未发生迁移,一直在农村生活、工作,直到时间 t_1 ;在第二时期(A),也就是在时间点 t_1 ,农村劳动力决定到城市务工,在城市里的工作生活时间为 $t_2 - t_1$;在时间点 t_2 ,该劳动力如决定返回农村,就进入第三时期(R),即劳动力回流阶段(在这里我们假设在农村,农业生产和养老可同时实现)。如果迁移劳动力决定永久迁居城市,那么 t_2 到 T 这段时间就表示劳动者失去劳动能力或者退休后养老阶段。我们假设迁移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①,他们不仅考虑当期的消费(C_s)和闲暇(L_s),还会考虑长期的生活保障(S_v)。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通过调整 t_1 和 t_2 时间点来实现效用最大化:

$$U = \int_0^{t_1} \mu(C_s^H, L_s^H, S_v^H) e^{-\rho t} dt + \int_{t_1}^{t_2} \mu(C_s^A, L_s^A, S_v^A) e^{-\rho t} dt + \int_{t_2}^T \mu(C_s^R, L_s^R, S_v^R) e^{-\rho t} dt \quad (1)$$

在(1)式中 μ 为各时点上劳动者的个人效用, ρ 为贴现因子,它反映劳动者对消费时间偏好的程度。效用函数 $U(C_s, L_s, S_v)$ 为凹函数,一阶导数大于0,二阶导数小于0。劳动者所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就是求解方程:

$$\text{Max } U(C_s, L_s, S_v) \quad (2)$$

约束条件为:

$$\int_0^{t_1} (C_s^H + S_v^H) e^{-\rho t} dt + \int_{t_1}^{t_2} (C_s^A + S_v^A) e^{-\rho t} dt + \int_{t_2}^T (C_s^R + S_v^R) e^{-\rho t} dt \leq \int_0^{t_1} f^H(L, E) e^{-\rho t} dt + \int_{t_1}^{t_2} f^A(L) e^{-\rho t} dt + \int_{t_2}^T f^R(L, E) e^{-\rho t} dt \quad (3)$$

其中,方程(2)为劳动者个人效用方程,效用取决于个人的消费(C_s)、闲暇(L_s)和长期保障^②(S_v)。方

^①在本研究中,我们所作的经济人假设,不仅是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而且还会以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②在本研究中的长期保障,是指居民在失去劳动力能力后、赖以维持生计的资源或者权利,具体研究中主要是指城市部门或者农村部门所能提供的失业保障、养老保障等等。

程(3)是预算约束曲线,即在整个生命周期(T)中当期消费(C_s)和长期保障性储蓄(S_v)不能超过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从在农村就业的生产所得($f^H(L, E)$)、进城务工所得工资收入($f^A(L)$)以及返乡后在农村的收入($f^R(L, E)$)。 L 是劳动力,包含可动态积累的人力资本,如知识技术(tn)、经验意识(e)和身体健康(h),在本模型中更多的是为了反映农民在城里打工期间积累的在农村能发挥显著价值的人力资本。 E 是劳动者的家庭禀赋^①,包括家庭人力资本(E_l)、家庭社会资本(E_s)、家庭经济资本(E_m)和家庭自然资本(E_n)。 $f'_E > 0$, $f'_L > 0$, 劳动力在农村的收入($f^H(L, E)$)是劳动者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函数,劳动力进城的工资收入($f^A(L)$)也是人力资本的增函数。 r_o^R 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 r^R 是在农村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在不考虑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影响的条件下也可表示非农部门在当地的扩张率,由当地的市场化程度和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决定。在方程中 $C_s, S_v, L, E_l, E_s, E_m, E_n$ 皆大于0。

本文重点考虑的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后在时间点 t_2 是否会选择离开城市回流到农村。如果在 t_2 时点选择回流到农村,那么在 $T - t_2$ 时间段 $f^R(L, E)$ 为劳动力回流后在农村的收入函数,并且在这一时期劳动者不仅要有消费还要有一定的储蓄;如果劳动力选择永久性迁移城市,那么在 $T - t_2$ 时间段为农村劳动力退休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期,在城市内不再有工资收入,在这一时期劳动者主要靠上一期的储蓄来满足消费需求。

(二) 迁移劳动力的城乡收入预期

我们只需要考察和比较在 t_2 时点劳动力继续留在城市就业的效用和返回到农村就业的效用。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一样,我们也认为影响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是否选择回流的主要经济因素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在本研究中是考虑城乡生活成本和长期保障的城乡预期收入。

1. 城市预期收入 Y_U

鉴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假设农村劳动力进城后先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很少一部分可进入正规部门,一旦进入正规部门就可以看作是城市居民。另外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是先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的“事先决定的工作”,然后才确定迁移到城市,所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为100%^②。在这里我们只考虑农村劳动力进城后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情况,农村劳动力以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收入为城市预期收入。我们假设城市非正规部门生产服从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L_m, K_m 分别为城市非正规部门生产投入要素劳动力和资本。 α_1, β_1 分别为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和资本的弹性系数 $0 \leq \alpha_1 \leq 1, 0 \leq \beta_1 \leq 1, \alpha_1 + \beta_1 = 1$ 。

在城市中,企业以雇工的边际产出设定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非正规部门的边际产出为 P_L^m 。 B_m 为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技术进步参数。考虑到劳动者个人的人力资本禀赋 θ 的差异,劳动者在城市非正规部门的预期收入为:

$$Y_U = f^A(L) = \theta \cdot P_L^m = \theta \cdot (1 - \beta_1) B_m \kappa_m^{\beta_1} \quad (4)$$

其中 $\kappa_m = \frac{K_m}{L_m}$ 为人均资本占有量; $\theta \in [\theta_L, \theta_H]$ 表示该劳动力人力资本禀赋,令 $\bar{\theta}$ 表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状况 $\theta_L \leq \bar{\theta} \leq \theta_H$; θ^* 为人力资本的分界点(threshold),由外部条件如城市部门就业的技术要求、市场化程度等决定^③。

2. 农村预期收入 Y_R

考虑到家庭禀赋和长期保障问题,在农村就业的劳动力一般来说不愿意放弃农业生产,因为进行农业生产可以同时照顾家庭赡养老人,并且放弃农业生产也意味着放弃对农村土地的拥有权,这对于收入水平一般的农民来说是对长期保障的丧失。另外,由于农业的劳动力边际产出要远小于城市部门,所以回流后劳动力在农村还会同时在当地寻找非农就业机会。劳动力在农村的非农收入包括在农村乡镇企业做工、在农村小型手工作坊做临时工以及个体经营等。回流后劳动力在农村的预期收入为:

$$Y_R = f^R(L_R, E) = r_o^R \cdot f_o^R(L_o, E) + r_1^R \cdot f_{n1}^R(L_n, E) + r_2^R \cdot f_{n2}^R(L_n, E) \quad (5)$$

①我们对家庭的界定为,有共同的经济预算,或者在一口锅中吃饭为一家。

②另外,我们重点考察的是在 t_2 时点,迁移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决策,这时该劳动力已经迁移到城市并正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所以对于城市预期收入,就是他们当前的收入水平。

③这种模型化人力资本的方法借鉴于梁义成等(2010)。

$f_o^R(L_o, E)$ 为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函数 $f_n^R(L_n, E)$ 为劳动力在农村的非农收入函数 $f_{n1}^R(L_n, E)$ 和 $f_{n2}^R(L_n, E)$ 是劳动力在农村进入企业务工或者自我创业的两种就业选择的收入函数。 L_o 为回流到农村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投入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 L_n 为回流到农村的劳动力在非农行业投入的有效劳动或劳动时间 $L_R = L_n + L_o$ 。 r_o^R 为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 r_1^R 和 r_2^R 分别为劳动力在农村找到一份非农工作和自我创业的概率。非农务工和自我创业二者不可兼业,只可选其一。

(1) 劳动力在农业部门收入

本文假定农业技术进步中立,并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我国的农业生产函数:

$$Q_o = A_o L_o^{\alpha_2} K_o^{\beta_2} D_o^{\varphi} e^{\phi d} \quad (6)$$

其中: Q_o 表示农业部门的产出 A 为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参数 L_o 表示农业部门用以生产 Q_o 产出的劳动者数量 K_o 表示农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 D_o 表示可用的固定数目的土地 d 表示可用的农业用地的质量。 α_2 、 β_2 、 φ 、 ϕ 分别为劳动、资本、耕地数量的弹性和耕地质量的系数。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边际产出分别为 P_o^L 、 P_o^K 、 P_o^D 。 l_o 为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有效劳动投入,那么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农业收入为:

$$f_o^R(L_o, E_o) = P_o^L \cdot l_o + \frac{E_m}{N_l} \cdot P_o^K + \frac{E_n}{N_l} \cdot P_o^D = \left(\frac{\alpha_2}{L_o} + \frac{E_m}{N_l} \cdot \frac{\beta_2}{K_o} + \frac{E_n}{N_l} \cdot \frac{\varphi}{D_o} \right) \cdot Q_o \quad (7)$$

(7) 式中 N_l 为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 $\frac{E_m}{N_l}$ 为回流劳动力所得的家庭经济资本份额 $\frac{E_n}{N_l}$ 为回流劳动力所得的家庭自然资本份额。我们令 P_o^L 等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投入的平均工资 ω_l P_o^K 等于农业生产中资本投入的平均回报率 ω_k P_o^D 等于农业生产中土地投入的平均回报率 ω_d 那么(7)式可改写为: $P_o^L \cdot l_o + \frac{E_m}{N_l} \cdot P_o^K + \frac{E_n}{N_l} \cdot P_o^D = \omega_l + \frac{E_m}{N_l} \cdot \omega_k + \frac{E_n}{N_l} \cdot \omega_d$ 。

(2) 在农村创业的劳动力收入

首先分析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经营的成本与收益。遵循一般的假定,无波动的非农生产服从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我们依然假设在农村的非农生产函数受到劳动力和资金的约束, L_n 为劳动力在非农经营中的有效劳动投入。 $TC_K(\cdot)$ 为非农经营融资的成本函数,它是家庭经济资本(E_m)、家庭社会资本(E_s)和经营资金总额(K)的函数^①。

$$TC_K(E_m, E_s, K) = \gamma \cdot K + \gamma \cdot (1/E_s) \cdot (K - \lambda \cdot E_m) \quad (8)$$

假设社会关系资本的临界值为1,拥有相对较多社会资本的家庭能减少融资成本。 λ 表示回流劳动力通过家庭经济资本^②能够获得的金融资本的参数 $0 \leq \lambda \leq 1$; 借贷资金(K_b)表示需要通过家庭社会资本获得的金融资本 $K_b = K - \lambda \cdot E_m$ 。 γ 为平均利率。家庭经济资本可以提供的金融资本占经营资金总额的比重为 σ $0 \leq \sigma \leq 1$ 那么成本函数可变为 $\gamma \cdot K + \gamma \cdot (1/E_s) \cdot (1 - \sigma) \cdot K$ 当 $K_b = 0$ 或者 $E_s \rightarrow \infty$ 时, $TC_K = \gamma \cdot K$; 当 $E_s \rightarrow 0$ 时, $TC_K \rightarrow \infty$ 。

非农经营中劳动力、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分别为 P_L^n 、 P_K^n 。在均衡条件下 $MC_K = P_K^n$ 即有:

$$P_L^n = (1 - \beta_3) B_n \left[\frac{1}{\beta_3 B_n} \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 - \beta_3}} = (\beta_3^{\frac{1}{\beta_3} - 1} - \beta_3^{\frac{1}{\beta_3}}) B_n^{\frac{1}{\beta_3}}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 - \beta_3}} \quad (9)$$

α_3 、 β_3 分别为非农生产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弹性系数 B_n 为农村非正规部门的技术进步参数 L_n 为劳动力在农村非农务工中的有效劳动投入。选择在农村当地企业或者小作坊务工的劳动力的预期收入为:

$$Y_{n1} = r_1^R \cdot f_n^R(L_n, E) = r_1^R \cdot \theta (\beta_3^{\frac{1}{\beta_3} - 1} - \beta_3^{\frac{1}{\beta_3}}) B_n^{\frac{1}{\beta_3}}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 - \beta_3}} \quad (10)$$

同上,选择在农村自我创业的劳动力的预期收入为:

$$Y_{n2} = r_2^R \cdot [f_n^R(L_n, E)] = r_2^R \cdot \left\{ \theta \cdot (\beta_3^{\frac{1}{\beta_3} - 1} - \beta_3^{\frac{1}{\beta_3}}) B_n^{\frac{1}{\beta_3}}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 - \beta_3}} + E_m \cdot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 \right\} \quad (11)$$

①这种模型化融资成本的方法借鉴于梁义成等(2010)。

②通过家庭禀赋获得的金融资本包括家庭经济资本提供的金融资本以及通过家庭社会资本等非正规渠道获得的金融资本。

三、长期保障、投资回报与劳动力回流

(一) 长期保障、生活成本与劳动力回流

农村迁移劳动力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并且他们不仅仅考虑当期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还要为以后长期生活做打算。由于他们已经在城市生活了 t_2 时间,对城市收入情况和生活成本已经比较了解,所以他们很容易可以估量出要在城市里定居,每月需要从收入中拿出多少用作长期保障的储蓄(S_U) $S_U > 0$ 。 S_U 是失去劳动劳动能力后居住城市的生活成本和相关人口政策的函数。相比较而言,在农村时,家庭禀赋就可以提供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等长期保障,尤其是农户所拥有的耕地可为劳动力提供粮食供给和养老保障功能。

另外,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的生活费用 C_U ,如相对昂贵的食品、住房及其他生活费用。而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只需要支付相对较低的生活费用 $C_R < C_U$ 。在这里我们假设城乡生活成本之差为 $\Delta C = C_U - C_R$ $\Delta C > 0$ 。

那么,劳动力城乡预期收入差距 D 为:

$$\begin{aligned} D &= Y_U - S_U - \Delta C - Y_R = f^A(L) - S_U - \Delta C - [r_o^R \cdot f_o^R(L_o, E) + r_1^R \cdot f_{n1}^R(L_n, E) + r_2^R f_{n2}^R(L_n, E)] \\ &= \theta \cdot (1 - \beta_1) B_m \kappa_m^{\beta_1} - S_U - \Delta C - r_o^R \cdot (\omega_l^o + \frac{E_m}{N_l} \cdot \omega_k^o + \frac{E_m}{N_l} \cdot \omega_d^o) - (r_1^R + r_2^R) \cdot \\ &\quad \theta (\beta_3^{\frac{1}{\beta_3}-1} - \beta_3^{\frac{1}{\beta_3}}) B_n^{\frac{1}{\beta_3}}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beta_3}} - r_2^R \cdot E_m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 \end{aligned} \quad (12)$$

在(12)式中, Y_U 为在城务工劳动力的城市名义预期收入(也可称为托达罗预期收入)①, $Y_U - \Delta C$ 为在城市务工劳动力扣除城乡生活成本之差 ΔC 后的城市短期预期收入, $Y_U - S_U - \Delta C$ 为在城市务工劳动力扣除长期保障性储蓄 S_U 和 ΔC 后的城市长期预期收入。

当 $D + S_U + \Delta C < 0$, 不考虑长期保障和城乡生活成本的城市名义预期收入小于回流农村后的预期收入,农村劳动力一般不会选择进城务工,即使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也会选择回流农村就业。

当 $D + S_U + \Delta C \geq 0$, $D + S_U < 0$, 即使不考虑在城市就业时的长期保障性储蓄 S_U , 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长期预期收入依然小于回流农村的预期收入,但是如果不考虑城乡生活成本差异的城市名义预期收入要大于回流农村后的预期收入,这时农村劳动力有可能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不过这类劳动者多是出于经济目的而进城务工,最终还是会选择回流农村就业。

当 $D + S_U \geq 0$, $D < 0$, 不考虑进城就业的长期保障性储蓄 S_U , 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短期预期收入要大于回流农村的预期收入,但是考虑城市生活成本和长期保障性储蓄 S_U 后的城市长期预期收入依然小于回流农村后的预期收入,所以这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一般有两种选择:或者会继续在城市就业,到退休年龄会回流到农村养老;或者在 t_2 时间选择回流到农村就业。总之,处于这一预期收入水平的农村劳动力不会也没有能力定居城市,最后都是要回流农村,而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当 $D \geq 0$, 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短期预期收入要大于回流农村的预期收入,并且在城市务工劳动力扣除城乡生活成本之差 ΔC 和长期保障性储蓄 S_U 后的城市长期预期收入依然大于回流农村后的预期收入,所以这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会继续在城市就业,并决定定居城市。

根据以上迁移劳动力不同的收入水平和预期收入也构成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D + S_U + \Delta C < 0$, 这时由于种种制度性原因,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就业和生活状况还不如在农村,一般不会发生迁移,或者在城务工的迁移劳动力开始选择回流农村;第二阶段 $D + S_U + \Delta C \geq 0$, $D + S_U < 0$, 这时不考虑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预期收入大于农村,所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多因经济目的进城务工,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并无在城定居的打算;第三阶段 $D + S_U \geq 0$, $D < 0$, 这时如果不考虑长期保障,迁移劳动力即使进入城市消费,他们在城市的预期收入也会高于农村的预期收入,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并开始学习和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没有能力定居城市;第四阶段 $D \geq 0$, 这时迁移劳动力已有能力在城市生活和定居,已经开始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的市民。中国当前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大多处于处

①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 Todaro)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欠发达国家劳动迁移与城市失业模型》一文中,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来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在托达罗劳动力迁移模型中,导致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就是不考虑长期保障和城乡生活成本的城市预期收入。

于第二和第三阶段 这也是中国半城市化和往复式迁移发生的根本原因。

在式(12)中 D 是城市预期收入和农村预期收入之差。在城市生活过程中 S_U 和 ΔC 都由外生因素决定 Y_U 中只有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 θ 可在城市部门就业过程中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逐渐积累 人力资本禀赋 θ 积累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部门的预期收入也会越高 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回流农村的概率也就越小。但是一般来说 农村劳动力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积累的人力资本并不足以使得他们能够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 反而成为了回流农村的动力。

(二) 人力资本积累、家庭禀赋效应与劳动力回流

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收入一般由两部分组成 纯农业生产收入 $f_o^R(L_o, E)$ 和农村非农收入 $f_n^R(L_n, E)$ 。由于农村市场化程度低 工商业发展相对滞后 会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当地非农就业的转移 劳动力在农村非农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为 r^R 。在农业生产性收入部分 $(\omega_l^o + \frac{E_m}{N_l} \cdot \omega_k^o + \frac{E_n}{N_l} \cdot \omega_d^o)$ 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投资回报由当地的农业经济政策和技术水平决定 而劳动者人均家庭禀赋 $\frac{E}{N_l}$ 是可以随着劳动者在就业时间的增加、家庭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不断增加的 并且 $\frac{E}{N_l}$ 值越大 劳动者回流农村后在农业部门的收入就越高 劳动者在农业部门单位劳动力投入的投资回报也就越高。

我们关心的是迁移劳动力在 t_2 时间回到农村就业后 家庭禀赋是否可以增加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投资回报? 为此 我们考察以下偏导: $\frac{\partial f_n^R}{\partial \theta}$ 、 $\frac{\partial f_n^R}{\partial E_s}$ 。

如果劳动力在农村选择非农务工 则有:

$$\frac{\partial f_{n1}^R}{\partial \theta} = r_1^R (\beta_3^{\frac{1}{\beta_3}-1} - \beta_3^{\frac{1}{\beta_3}}) B_n^{\frac{1}{\beta_3}}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beta_3}} \geq 0 \quad (13)$$

$$\frac{\partial f_{n1}^R}{\partial E_s} = r_1^R \cdot \theta (\beta_3^{\frac{1}{\beta_3}-1} - \beta_3^{\frac{1}{\beta_3}}) B_n^{\frac{1}{\beta_3}} \left[(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beta_3}} \frac{1}{\frac{1}{\beta_3} - 1} \left(1 + \frac{1}{E_s} \right)^{\frac{1}{\beta_3}-1} \frac{1}{E_s^2} \geq 0 \quad (14)$$

如果劳动力在农村选择自我创业 则有:

$$\frac{\partial f_{n2}^R}{\partial \theta} = (\beta_3^{\frac{1}{\beta_3}-1} - \beta_3^{\frac{1}{\beta_3}}) B_n^{\frac{1}{\beta_3}}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beta_3}} \geq 0 \quad (15)$$

$$\frac{\partial f_{n2}^R}{\partial E_m} = \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geq 0 \quad (16)$$

人力资本禀赋 θ 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就业过程中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逐渐积累的。 $\frac{\partial f_{n1}^R}{\partial \theta} \geq 0$ 和 $\frac{\partial f_{n2}^R}{\partial \theta} \geq 0$ 表明人力资本禀赋 θ 对于劳动力在农村当地企业务工或者自主创业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禀赋 θ 积累水平越高 则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非农就业中的预期收入也会越高 而人力资本的增加又不足以帮助他们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 这部分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概率也就越大。另外 结合式(7)也可以看到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就业过程中逐渐积累的人力资本禀赋 θ 在纯农业生产中并未发生明显的效用 而劳动力在农村非农就业中的投资回报要高于在纯农业部门中的投资回报。所以 在农村中 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者会倾向于在当地非农就业 以收获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

$\frac{\partial f_{n1}^R}{\partial E_s} \geq 0$ 表明家庭社会资本越丰富 劳动力回流农村后进入当地企业务工的投资回报就越高 劳动力对农村的预期收入也就越高。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劳动力从事纯农业生产、进城务工和在家乡创业都没有明显影响。

$\frac{\partial f_{n2}^R}{\partial E_m} \geq 0$ 表明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对回流劳动力进入当地企业务工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 还可计算得到 $\frac{\partial f_{n1}^R}{\partial \sigma} \geq 0$ 表明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 家庭可以为从事非农经营提供的资金支持就越多 劳动力回流农村后非农就业的投资回报也就越高。

相对于在城市务工 回流劳动力在农村可以更好地利用家庭禀赋 不仅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投资

回报,而且还可以获得家庭的长期保障,这正是导致部分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主要原因。家庭禀赋 E 可以使得迁移者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家乡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并且家庭禀赋的经济效应只有在迁移者家乡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和实现。

(三)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均衡条件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状态。在城市部门中,由于制度性外生的最低工资要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导致伴随大量城市失业的就业均衡。由于农业边际生产率非常低,在农业部门中依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临近城市扩张的影响、当地农村工业化推进以及当地政府对迁移劳动力返乡创业优惠政策的实施,劳动力输出地的非农产业开始增长,大量进城务工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在当地非农部门就业。在我们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中,劳动力流动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只有在城乡预期收入相等时,才会达到流动均衡。但劳动力的外出和回流依然会发生,只是走出了往复式流动状态。

劳动力流动的均衡条件有三种情况,分别为:

第一类均衡: $Y_U - S_U - \Delta C = Y_R$, 即:

$$\theta \cdot (1 - \beta_1) B_m \kappa_m^{\beta_1} - S_U - \Delta C = r_o^R \cdot \left(P_{L_o}^o + \frac{E_m}{N_l} \cdot P_K^o + \frac{E_n}{N_l} \cdot P_D^o \right) + (r_1^R + r_2^R) \cdot \theta (\beta_3^{\frac{1}{\beta_3}-1} - \beta_3^{\frac{1}{\beta_3}}) B_n^{\frac{1}{\beta_3}}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beta_3}} + r_2^R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 \quad (17)$$

(17) 式表示,考虑长期保障和城乡生活成本的城市长期预期收入,等于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预期收入。在这一均衡条件下,回流农村的劳动力会根据自己的入力资本禀赋和家庭禀赋状况来选择兼业情况,以使得在农村的总收益最大。农业生产的产出情况是由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边际产出、以及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状况决定的,劳动力在农村非农收入情况是由当地非农就业岗位的数量、银行利率、劳动力入力资本禀赋和家庭社会资本状况决定的。并不是所有人随时可以获得一份非农就业岗位,所以大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后会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在当地非农部门就业。第二和第三类劳动力流动均衡是第一类均衡的特殊情况。

第二类均衡: $Y_U - S_U - \Delta C = r_o^R f_n^R(L_n, E)$, 即:

$$\theta \cdot (1 - \beta_1) B_m \kappa_m^{\beta_1} - S_U - \Delta C = (r_1^R + r_2^R) \cdot \theta (\beta_3^{\frac{1}{\beta_3}-1} - \beta_3^{\frac{1}{\beta_3}}) B_n^{\frac{1}{\beta_3}}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frac{1}{1-\beta_3}} + r_2^R \left[\left(1 + \frac{1}{E_s} \right) (1 - \sigma) \gamma \right] \quad (18)$$

(18) 式表示,考虑长期保障和城乡生活成本的城市长期预期收入等于劳动力回流农村从事非农就业的预期收入。在这一均衡条件下,回流农村的劳动力根据自己的入力资本禀赋和家庭社会资本状况选择在农村非农部门就业。从事非农就业(或自主创业)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或者初始金融资本,所以一般来说,入力资本禀赋(θ)较高,或者家庭社会资本(E_s)丰富的农村劳动力会选择在当地从事非农就业,尤其是在家乡自主创业。

第三类均衡: $Y_U - S_U - \Delta C = r_o^R f_o^R(L_o, E)$, 即:

$$\theta \cdot (1 - \beta_1) B_m \kappa_m^{\beta_1} - S_U - \Delta C = r_o^R \cdot \left(P_{L_o}^o + \frac{E_m}{N_l} \cdot P_K^o + \frac{E_n}{N_l} \cdot P_D^o \right) \quad (19)$$

(19) 式表示,考虑长期保障和城乡生活成本的城市收入长期预期等于劳动力回流农村从事单纯农业生产的预期收入。在这一均衡条件下,回流农村的劳动力根据自己的入力资本禀赋、家庭自然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状况选择在农村完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进行纯农业生产边际产出要小于非农就业,但是进行农业生产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没有技术和资本积累的门槛,所以一般来说,入力资本禀赋(θ)较低、家庭社会资本(E_s)和家庭经济资本(E_m)较欠缺的农村劳动力会选择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当地存在土地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家庭入力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丰富的劳动力会租赁大量的土地,从事纯农业生产,并通过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使得在农村收益最大化。

四、基于微观调研数据的检验

(一) 数据介绍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于 2005 年 7 月对武汉市迁移劳动力做的

抽样调查。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武汉市7个主城区的50个社区,共涉及44个街道。每个社区又随机抽取15户迁移劳动力户作为调查对象,选择其中的12户组织专门调查员入户调查,共发出问卷600份,回收60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593份,有效率98.8%。在我们调查的数据中,就业形式属于雇主或自我就业的迁移劳动力占71.4%;而雇员或员工的迁移劳动力占迁移劳动力就业总数的28.6%。由于此次调查是入户调查,受访者中的集体户较少,可能导致部分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集体聚居的迁移劳动力被遗漏,但整体上还是反映了武汉市农村迁移劳动力生活状态及在相关社会服务业等低门槛、低技能的行业就业的总体发展趋势。

根据前文的分析,在本部分模型构建中,重点考察城乡投资回报和长期保障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另外还引入了迁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在外就业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城乡投资回报。在模型中我们引入城乡预期收入作为城乡投资回报的替代变量,分别为城市预期收入、农村预期收入、城乡预期收入差距^①和在城最低生活成本估计。在2005年武汉市调研数据中,我们对迁移劳动力的城乡预期收入做了调查。统计分析显示,迁移劳动力对城市的预期收入平均为每月729.14元,对农村的预期收入为人均每月354.92元。

长期保障。由于迁移劳动力既有农民身份,并且一般在农村还有家庭和财产,现在又在城市务工、生活,他们有着城乡居民的双重身份和特征,本研究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来分析迁移劳动力的长期保障状况,在农村是家庭禀赋,在城市则是和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福利。

家庭禀赋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等等,为迁移劳动力提供长期保障的主要是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可以为劳动力就业再选择提供支持,在模型中用进城务工时所使用的社会网络来做代理变量。问卷提供了“在外务工取得工作的主要途径?”,本研究将通过社会网络设置为1,自谋职业设置为参照组。家庭自然资本是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生活保障资源,在模型中用耕地数量来衡量,为连续变量。

迁移劳动力和家乡的联系,如往家乡汇款、通信等等,一方面可看作是迁移劳动力对家庭禀赋的投资,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迁移劳动力和家乡联系的紧密度。问卷提供了“您目前和原住地有何联系(可选多项)”4个选项为:(1)向家人或亲友汇款;(2)经常给家乡亲友通讯;(3)为家乡亲友提供各种就业与经济信息;(4)联系很少。为了实现变量的二分,将(4)联系很少设置为1,选择其他三个任何一个或多个的都设置为参照组(设为0)。

迁移劳动力要实现自己在务工城市的劳动保障权利和公民权利,就必须获得务工所在地的城市户籍,以获得在城市生存发展的长期保障。解决迁移劳动力的城市户籍,是减少大规模的城-乡循环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选择。在模型的变量选择中,将“您最需要政府提供的帮助”第一选择认为是“容许迁入户口”设置为1,其他如增加就业机会、保障权益等设置为参照组。

(二) 计量分析

1. 长期保障对迁移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整体结果来看,长期保障状况是影响迁移劳动力留城或者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分因素来看,在反映家庭禀赋的指标中,家乡有承包耕地对迁移劳动力的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发生比值为0.922,意味着承包耕地数量每增加1亩,迁移劳动力倾向于回流的概率就会增加7.8%(见表1)。迁移劳动力在城市里通过自身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获得工作,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有着非常强的边际影响。也就是说丰富的社会资本,尤其是能够在城市中提供支持的社会资本,会增加迁移劳动力留城发展的意愿,并且对雇主的影响更为明显。从对家庭禀赋的投资状况来看,相对于常和家乡汇款、通信,很少和家乡联系的迁移劳动力留城意愿更强一些。全样本模型的发生比值显示,和家乡很少联系的迁移劳动力的留城意愿是常向家乡汇款和通信人的4.44倍(见表1)。和家乡汇款、通信是一种感情的维系,也是对回流农村后重新获得长期保障的投资。如果在农村不能够获得这种保障或者不需要,他们就会选择争取在城市生活的长期保障。而与一系列城市社会福利和长期保障相联系的城市户口,就成为有留城意愿迁移劳动力争取的另一个对象。

^①这一变量是通过城市预期收入减去农村预期收入计算所得。

表 1

迁移劳动力留城意愿的决定模型

模型		全部样本: 控制城乡差距预期		全部样本: 控制城乡收入预期		雇主样本: 控制城乡差距预期	雇主样本: 控制城乡收入预期
因素	变量	B	Exp(B)	B	Exp(B)	B	B
城乡预期	城乡收入差距预期	0.003 ^{**} (0.001)	1.003			0.01 ^{***} (0.004)	
	城市收入预期	—		0.003 ^{**} (0.001)	1.003	—	0.012 ^{**} (0.005)
	农村收入预期	—		-0.004 [*] (0.002)	0.996	—	-0.002 (0.005)
	城市生活成本估计	-0.003 ^{***} (0.001)	0.997	-0.004 ^{***} (0.001)	0.996	-0.014 ^{**} (0.006)	-0.024 ^{**} (0.012)
长期保障	家乡承包耕地数量	-0.081 [*] (0.076)	0.922	-0.094 (0.081)	0.910	-0.5 (0.353)	-0.826 [*] (0.452)
	在城获得工作途径(以自谋职业为参照)						
	通过社会网络	3.684 ^{***} (1.013)	39.822	4.052 ^{***} (1.076)	57.522	12.405 ^{***} (4.694)	18.294 ^{**} (8.951)
	与家乡联系频度(以常和家乡汇款、通信为参照)						
	很少联系	1.491 ^{**} (0.77)	4.443	1.634 ^{**} (0.830)	5.125	7.568 ^{**} (3.298)	11.942 ^{**} (5.760)
	最希望政府的政策帮助(以增加就业机会、保障权益为参照)						
	容许迁入户口	-3.374 ^{**} (1.431)	0.034	-3.512 ^{**} (1.473)	0.030	-12.052 ^{**} (5.637)	-20.991 [*] (11.116)
	年龄	-0.08 [*] (0.047)	0.923	-0.130 ^{**} (0.062)	0.878	-0.518 ^{**} (0.228)	-0.701 ^{**} (0.356)
	性别(以女性做参照组)						
	男性	-0.862 (0.745)	0.423	-1.112 (0.815)	0.329	-3.209 [*] (1.91)	-4.355 (3.045)
控制变量	婚姻状况(以未婚未参照)						
	已婚			-1.360 (1.094)	0.257	-6.091 [*] (3.391)	-9.776 [*] (5.565)
	在外务工时间	0.08 (0.066)	1.083	0.064 (0.067)	1.066	0.382 ^{**} (0.171)	0.658 ^{**} (0.323)
	就业类型(以雇员为参照)						
	雇主	2.622 ^{***} (1.019)	13.769	3.318 ^{***} (1.181)	27.604	—	—
	参加过技术培训(以无为参照)						
	有	0.943 (0.856)	2.569	1.087 (0.911)	2.964	8.116 ^{**} (3.816)	13.915 [*] (7.332)
	转换工作次数(以1次或者0为参照)						
	2次以上	0.77 (0.711)	2.161	0.795 (0.720)	2.214	1.088 (1.569)	1.872 (2.213)
	常数项	2.729 (2.559)	15.311	4.937 (3.040)	139.302	13.74 [*] (7.763)	16.690 (10.437)
有效样本		594		594		408	408
卡方值		50.906 ^{***}		53.155 ^{***}		61.068 ^{***}	64.354 ^{***}
Nagelkerke R ²		0.527		0.546		0.81	0.84

注: (1) ***表示0.01水平下显著, **表示0.05水平下显著, *表示0.1水平下显著。(2) Exp(B)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当该变量增加一个单位时的优势比 OR_2 与原来的优势比 OR_1 的比值。

在迁移劳动力选择的最需要政府提供的政策帮助中, “容许迁入户口”对迁移劳动力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数据模型的发生比来看, 相对希望获得其他政府帮助, 如增加就业机会、保障权益等等, 希望帮助解决城市户口的迁移劳动力倾向于回流的概率是前者的28倍。

2. 城乡投资回报对迁移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表1回归结果显示, 城乡收入差距预期和城市收入预期对迁移劳动力是否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且对雇主群体留城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 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预期值越大, 劳动力越容易选择留在城市。城乡收入差距预期每增加1元, 迁移劳动力倾向于留城的概率会增加0.3%, 其中雇主会增加1%。可见, 随

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农村投资回报预期较高的迁移劳动力更倾向于回流农村发展。另外,城市生活成本的估计对迁移劳动力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城生活成本估计值每增加1元,迁移劳动力倾向于回流的概率就会增加0.3%。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特殊的转轨过程和制度环境为背景,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尝试建立一个解释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微观模型。模型侧重分析家庭禀赋改变劳动力迁移预期以及投资回报率(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的条件下,劳动力如何通过方向不同的迁移决策来回应制度约束,改善自己的长期福利。通过理论推导和经验验证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家庭禀赋的长期保障效应和投资回报效应是当前部分迁移劳动力主动回流农村的主要动力,而长期保障的缺失也是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关键障碍。第二,农村迁移劳动力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不仅仅考虑当期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还会考虑长期保障,为以后生活做长期打算。将长期保障变量引入迁移决策模型,改变了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均衡条件。第三,从家庭禀赋作为个人发展能力拓展的视角来看,家庭禀赋可以使得迁移者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家乡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并且家庭禀赋的经济效应只有在迁移者家乡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和实现。由于自身文化程度和外界制度条件的约束,农村劳动力进城后主要是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多年的外出务工经历使得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有所积累,但是他们在城市部门向上发展的空间和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几率很小。而这种积累在返乡后可以盘活家庭已有的资源禀赋,使得这些积累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第四,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不能获得长期保障,就很容易选择回流,或者是在城市和农村间往复式迁移,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城市部门中实现更高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还可以维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的长期保障。

依据前文的研究,我们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1. 应该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和回流。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劳动力可以更好地利用农村家庭禀赋。各级政府应该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提供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要进一步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构建就业信息交流平台,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流出地政府应通过对回流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政策扶持,改善农村融资环境,提高他们回乡创业能力和多方位发展的机会。

2. 城市部门应该重视对迁移劳动力长期保障的提供与维护。从“民工潮”到“返乡潮”和“民工荒”,其背后折射的是这一特殊的职业群体长期保障的缺失,这也是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难点和重点。长期保障的重点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应建立流动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让迁移劳动力与城市正规部门劳动力一样享受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地方政府应在居住地和就业地配置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政策,在尊重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意愿的基础上,根据迁移劳动力需要,遵循自愿、合意的原则,通过市场手段稳步推进人口城镇化。

3. 应该构建迁移劳动力晋升及进入城市正规部门的通道,这不仅是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一个合理、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其成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实现更高的个人价值。

参考文献:

1. 白南生、何宇鹏 2003《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载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30页。
2. 李路路 2003《向城市移民: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载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6-133页。
3. 梁义成、Marcus W. Feldman、李树茁、Gretchen C. Daily、黎洁 2010《离土与离乡:西部山区农户的非农兼业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
4. 刘铮 2006《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悖论——“农民工回流”的成因及效应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5. 张露文 2005《农民工回流问题的理论和案例分析》,载于张曙光、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第3卷)》,法律出版社第3卷,第48-63页。
6. 章铮 2009《从托达罗模型到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7. 周大鸣 2005《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
8. 周天勇、胡锋 2007《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反思和改进》,《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9. Bastia J.T. 2011.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Return Migration in Times of Cri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3(4): 583-595.
10. Davies R. B. and A. R. Pickles. 1991. "An Analysis of Housing Careers in Cardif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3(1): 629-650.

11. Dustmann J. 2003. "Children and Retur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6(4): 815 – 830.
12. Eswaran M. and A. Kotwal. 1986. "Access to Capital and Agrarian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Economic Journal* 96(2): 482 – 498.
13. Guilmoto J. Z. and S. Frederic. 2001.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Migration Networks in Development Countries." *Population: an English Selection* 13(2): 135 – 164.
14. Mesnard A. 2004.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6(2): 242 – 62.
15. Sander M. 2007. "Return Migration and the 'Healthy Immigrant Effect'." SOEP Papers on Multidisciplinary Panel Data Research at DIW Berlin.
16. Stark O. 1996. "On the Microeconomic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Trade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Jagdish Bhagwati* ed. V. N. Balasubramanyam and D. Greenaway, 32 – 41. London: Macmillan.
17. Thomas K. J. A. 2008. "Return Migration in Afric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Labor Market Success: Evidence from Ugand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2(3): 652 – 674.

Long – term Security ,Return of Investment and Rural Labor Remigration Decision

Shi Zhilei¹ and Yi Chengdong²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Reg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al Estate Manage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icroeconomic model to explain the remigration of rural labors and analyze how the labor given the family endowment changes the expect of migration and 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responds to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improves their long – term welfare through the multi – direction migration decision. And then it uses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relevant data from the surveys undertaken in rural area by the writers to set up multi – line regressive models ,which confirms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the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study above ,this paper shows that family endowment security effect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ir remigration decision ,another major reason is that such a decision is optimal for them to gain the payoff of both human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ed in the city.

Key Words: Long – term Security; Return of Investment; Labor Remigr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24 J61

(责任编辑: 彭爽)

(上接第 29 页)

12. Levin, J. 2003. "Relational Incentive Contra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3): 835 – 857.
13. Macleod, W. , and J. Malcomson. 1989. "Implicit Contracts,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nd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Econometrica*, 57(2): 447 – 480.
14. Macleod, W. 2006. "Reputations, Relationships and the Enforcement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IZA Working Paper No. 1978.
15. Mukherjee, A. 2003. "Skill Acquisition Under Implicit Contract." Mime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6. Neal, D. 1995. "Industry – Specific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Displaced Worker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3(4): 653 – 677.
17. Oosterbeek, H. , R. Sloof, and J. Sonnemans. 2007. "Promotion Rules and Skill Acquisi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Economica*, 74(2): 259 – 297.
18. Prendergast, C. 1993. "The Role of Promotion in Inducing Specific Human Capital Acquisi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2): 523 – 534.

Dual Promotion Ranks ,Reputation and Employee's Specific Skill Acquisition

Li Xiaoying¹ and Zhang Fenglin²

(1: Center for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n the enterprise ,the employees with specific skill will face a moral hazard problem ,leading to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their skills. Existing literatures have shown that promotion can solve this problem under some condition from vertical promotion ranks and horizontal promotion ranks respectively. But these solutions are inefficient and they are based on one – shot game ,disregarding the firm's concern of reputation. In a repeated game framework ,introducing the relational contract based on reputation ,this pap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ncentive and efficiency of dual promotion ranks for employee's specific skill acquisition. The conclusions are: for the firm with high reputation ,dual promotion ranks can promote the employee's skill acquisition and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work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putation ,the firm will induce skill acquisition relying more on horizontal promotion ranks and less on vertical promotion ranks.

Key Words: Specific Skill; Promotion; Reput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C73 J24 J31

(责任编辑: 陈永清)